

## 書評

# 戰爭、國家、記憶——學校歷史教科書中 二次世界大戰的國際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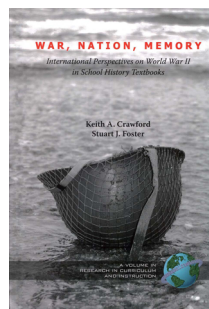
## War, Nation, Memor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World War II in 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by Keith A. Crawford and Stuart J. Foster

Charlotte, NC: Information Age, 2007. 209 pp.

ISBN: 978-1-59311-852-5



本期評論《戰爭、國家、記憶》一書，探討不同國家之歷史教科書對二次世界大戰的內容處理與觀點呈現，特別邀請到對教科書研究與國族主義與認同議題富研究興趣的卯靜儒教授，及歷史教學研究與實務經驗豐富的黃春木老師，分別對該書進行導讀討論。卯靜儒教授提出本書之綜觀探討、評析書寫結構，及思索學術研究可進一步深究的焦點與方向；黃春木老師則以其研究與教學經歷，反思歷史教科書中對「戰爭」的書寫及未來可能的轉變。

## 卯靜儒

《戰爭、國家、記憶——學校歷史教科書中二次世界大戰的國際觀點》此書由 IAP 出版社於 2007 年出版，屬課程與教學研究系列叢書之一。由 Keith Crawford 與 Stuart Foster 兩位社會科與歷史教育專長的學者合著。從書的標題來看，這是一本有趣的書，切入觀點很特別。Crawford 與

Foster 從戰爭切入，討論學校的歷史教科書與國家建構及記憶選擇的關係，特別是他們從英國、德國、法國、中國、日本及美國六個不同國家的學校教科書分析，提供一個多國不同二次大戰經驗下，相似的國家認同建構與教科書內容選擇與書寫的故事。

全書共分十章，除第一章導論外，第二章「學習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英國與德國歷史教科書的比較分析」，第三章「戰時或戰爭犯罪？英國歷史教科書德勒斯登的轟炸」<sup>1</sup>，第四章「法國歷史教科書中戰時的抵抗與共謀」<sup>2</sup>，第五章「中日戰爭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記憶之政治」，第六章「日本歷史教科書中的責任與受害」，第七章「意識型態與敘事：美國歷史教科書中二次大戰的描繪」，第八章「二次大戰中的英國女人在教科書中的圖像，1942-2004」，第九章「二次大戰中的大英帝國與國協：英國歷史教科書中的選擇與遺漏」，第十章「後記：二次世界大戰與記憶的景致」。章節雖多，不過全書只有 209 頁。可見每章篇幅並不長，容易閱讀。

兩位作者認為教科書對於國家（同時也是學生）的共同記憶與認同有卓著而深遠的影響，也是教育者的責任。基於一本好的教科書需要有足夠的學術性研究知識作基礎，這也是他們寫這本書的目的。二次世界大戰代表人類歷史上最具有破壞性的全球衝突，60 個國家參與其中，四分之三的世界人口受其影響。作者認為二次世界大戰在全世界歷史教育中以及學校歷史教科書中占據最重要的位置。因此，選擇以二次世界大戰作為切入點，批判性檢視六個國家對於二次世界大戰不同而複雜的觀點，並分析教科書如何成為社會化或宣傳的工具。綜觀全書，只有一個

<sup>1</sup> 原來英文是 'The Destruction of Dresden' 指的是 1945 年 2 月 13 日，二次大戰結束前夕，盟軍轟炸位於東德的德勒斯登。此事件的主要爭議是，在戰爭即將結束前夕，德勒斯登需要這樣被大規模的轟炸嗎？有人認為盟軍對德勒斯登的轟炸，其歷史文化價值的摧毀可能更甚於軍事行動的價值。

<sup>2</sup> 法國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合法政府迫遷到維琪(Vichy)，也稱維琪政府。此政府一方面與英美維持正式外交關係，另一方面也與德國納粹共謀，實行國家社會主義，屠殺猶太人。同時期也有反對維琪政府與反德國佔領的地下抵抗組織運動的大規模進行。教科書分析主要呈現法國這段歷史的矛盾——共謀與抵抗。

重要論點，那就是——教科書中的知識不會是「中立」的，國家通常呈現某一特定的戰爭記憶，以塑造有利自己國家形象的共同集體記憶，如國家英雄主義或製造敵人，以確認自我價值感（法國、美國），或故意忘記，輕描淡寫不願面對（英國、德國），或呈現受害者形象以規避戰時的錯誤與責任（日本），或激化國家民族意識（中國）等等。簡而言之，全書以這六個國家的歷史教科書為例，探索戰時的記憶是如何藉由學校教科書的描繪，呈現歷史事件的記憶與遺忘與國家認同建構的關係。

全書雖然有一致的觀點，但每章的書寫架構都不同。如第二章，採比較分析觀點，看英國與德國教科書如何描寫猶太人的屠殺，比較兩個國家歷史教科書之書寫方式，如何反映國家教他們的學生面對此歷史經驗之責任分配與譴責分攤的潛在功能。第三章則是以德勒斯登轟炸事件為例，檢視英國教科書如何描寫，立場為何，究竟是以戰時的角度或與戰爭犯罪的角度來描寫呢？第四章處理法國歷史教科書如何描寫與再現二戰期間維琪政府與地下抵抗運動；而且花不少篇幅介紹法國教科書的選用制度。第五與六章則分別處理中日兩國對於二戰的不同觀點與呈現方式，特別是分別對於南京大屠殺的不同陳述，有趣的是兩個國家同時認為自己是大戰的受害者。第七章對於美國的處理，不同於前面幾個國家以特定單一歷史事件分析為例，則呈現一般美國國家形象的教科書描述，作者將美國教科書中所呈現的二次大戰的美國國家形象分為理想主義、慈善與權力、團結與愛國主義、國家主義觀點等。第八章比較特別，探討英國教科書從 1942 到 2004 年不同的時間階段，教科書裡面所呈現的二次大戰中女性形象的轉變。作者認為過去十幾年新史學研究觀點的引進，使得教科書的書寫更具啓蒙性與綜合性。本章也是全書篇幅最長的一章，有 30 頁之多。我則認為本章是全書中最有趣與深度的一章，但卻也與其他各章顯得特別的不一樣。第九章則是分析英國的教科書如何呈現大英國協其他國家在二次大戰中的角色與人民的生活經

驗。第十章的後記，則算是回答本書潛在的兩個（卻有關連的）「盲點」：一是在全球化時代，國家界線逐漸模糊，處理國家認同與教科書之關係是否會有不同；二是全書呈現的是各國片段與分裂的二次大戰之歷史觀，我們還缺乏世界觀點的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也許讀者會發現第十章的後記，如果換過來是前言，那麼整本書的內容與處理方式，可能會很不一樣。

本書最大的特色，是提供六個國家不同語言的教科書分析。教科書研究，若不是以主編收錄文章的方式，很少能像本書的作者同時分析這麼多國家的教科書，語言的障礙通常是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但本書作者克服這樣的困境，特別是在中國與日本的教科書的分析兩章，請中文與日文助理幫忙翻譯教科書內容。不過，這兩章的內容可能對於國內讀者而言，會比較接近常識，可能限於語言，缺乏對於資料的進一步掌握，難以呈現更深入的分析。不過，這兩章卻能幫助英語系或其他國家的讀者更瞭解中國與日本的情況。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雖然此書以國際觀點出發，但檢視全書的內容，英國的材料（除第四、五、六、七章外）可能占超過一半以上。當然，這也與兩位作者的英國學術背景有關。Keith Crawford 目前在澳洲 Newcastle University 任教，但先前在英國 Edge Hill University 任教。Stuart Foster 則是目前任教於倫敦大學的教育學院。這也讓我好奇，若此書是邀請各國的學者來寫各自國家的教科書分析，會呈現怎樣的風貌呢？

本書篇幅不長，採用的觀點（如選擇性傳統，記憶與國家等）與使用的資料（簡易的教科書內容分析）等，對於國內讀者而言，可能都很熟悉，唯有對於某些歐洲歷史事件需要一點背景知識外，本書應評為「淺顯易懂」，適合一般讀者或大學部學生閱讀。不過，若對於進階的讀者而言，那麼這樣的觀點與內容，可能很難被滿足。對歷史專業而言，本書缺乏史料證據的討論，無法深入分析歷史事件的意義；對於教育專業而言，教科書的研究觀點過於普遍（第八章除外），教科書的分析方法也不夠嚴謹。但一如前面所言，本書的最大貢獻是提供歷史教科書的國際觀點。只是，作者仍停留於提供不同國家的觀點，若能進一步比較會

更有趣（如第二章）；若能，進一步分析各國課程架構、教學評量與教科書出版的政治經濟對教科書編寫的影響；甚至，若能，將全球化觀點帶進來看各國如何隨著時間改變寫二次大戰歷史的觀點（如第八章的方式）等等，這些新的挑戰若真的克服了，那麼這本書會更有趣，也會更具有教科書研究的學術價值。

## 黃春木

人類史上損傷最為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於今（2010）年剛好結束六十五週年，然而這個似乎逐漸遠離的悲劇，卻因4月10日波蘭總統卡欽斯基（Lech Aleksander Kaczyński, 1949-2010）的專機於俄羅斯境內墜毀，同行97人全部罹難，肇因卻是眾說紛紜，突然間，大戰傷痛又糾結人心。卡欽斯基是為了紀念「卡廷事件」（Katyn Massacre）七十週年，前往俄羅斯會同主持相關活動；「卡廷事件」發生於1940年4月，當時蘇聯軍隊在卡廷森林屠殺波蘭政治、軍事、知識菁英約兩萬兩千人，成為波蘭人民永遠刻骨銘心的一段歷史。在蘇聯瓦解之後，此事件一直是俄羅斯、波蘭兩國之間政治互動的障礙。2007年，波蘭政府訂定4月13日為卡廷事件遇難者紀念日，俄羅斯政府也逐漸願意面對這個戰爭悲劇，但隨著墜機事件的發生，波蘭人民再度大慟，而與俄羅斯的關係也重新面臨考驗。

戰爭其實從來就不曾遠離，即使在寶貴的「和平」時期，人類依然得沈重地承受戰爭的影響，並且忙碌地以各種形式牢記、提醒、準備；而弔詭的是，戰爭始終與文明的興和衰都緊密關連，現存的每一國家與社會都難以豁免，不約而同戮力於療傷止痛、振衰起弊、富國強兵，且不忘爭奪發言權。國際間關於戰爭的論述或詮釋，向來多由強國所主導，於是「人道」、「正義」、「和平」常與「帝國主義」糾葛，難以辨明。

但在個別國家內，關於戰爭的論述或詮釋則往往充斥著「民族主義」，各國政府對於國家認同的建構或集體記憶的形塑，向來不遺餘力，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及教導正是最重要的途徑之一。於是，在迎接 5 月 8 日「歐戰勝利紀念日」、8 月 15 日「對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之際，我們不禁得質問：「第二次世界大戰真的結束了嗎？」

Crawford 與 Foster 合著的《戰爭、國家、記憶》即針對英、法、德、美、中、日等國歷史教科書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呈現的內容及觀點，進行國際比較與探究。以下即參考此書的主要論點，佐以筆者實際參與歷史課程綱要修訂、教科書編寫、課堂教學經驗，以及對於相關課題長期的思考與反省，嘗試分享一些心得。

《戰爭、國家、記憶》關切的是「國家」如何進行歷史課程發展，直接指明歷史教科書不同於歷史學術著作，即使教科書編寫者是歷史學者，亦經常主動或被動地糾葛於許多有形無形的文化、意識型態、政治框架；在「記憶」與「遺忘」之間，各國政治及知識菁英的強力主導顯而易見，而「價值」便透過所謂「事實」具現於教科書文本中。

歸納本書各章觀點，加上筆者個人的研究與教學經驗，各國歷史教科書關於戰爭的編寫不外乎四種方式，分別是「旁觀別人的痛苦」、「權衡切身的關連」、「貶抑敵人的存在」，以及「讚揚同胞的奉獻」。

例如英國教科書在處理「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時，並未特別重視，多只是當成一般性的事件(「旁觀別人的痛苦」)，然而作為「當事人」的德國，教科書中便深切反省，以較多篇幅探討，並且將此「罪行」連結當前德國社會的人權課題(「權衡切身的關連」)。值得注意的是，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德國人乃以「內疚」之心反省大屠殺，因而在教科書上多所著墨，但新世代對此事件則僅抱持著「責任感」，態度已有所轉變。

相對於「猶太人大屠殺」，英國直接涉入、造成重大傷亡的「德勒斯登大轟炸」(1945年2月13-14日)，到底是必要的軍事攻擊，或根本是一種戰爭罪行？英國教科書雖多傾向於後者的探究，卻無一以「罪行」

論斷，而是採取不同資料的呈現、問題設計等，讓學生可以想像、理解大轟炸的恐怖，並在歷史脈絡下思考與討論此轟炸決策的合理性。

地方分權的英國教科書對待「德勒斯登大轟炸」，呈現「權衡切身的關連」另外一種處理方式，以「歷史思考」的練習做引導，某種程度上迴避了獨斷的解釋。但法國教科書處理被德國佔領期間法國人民的「合作」或「抵抗」課題時，這是一個比英國參與大轟炸更為「切身」的課題，在中央集權政治架構下的法國教科書立場相當明確地以後者為基調，對於維琪政府（Vichy France, 1940-1944）與德國「合作」的史實，採取避重就輕的方式處理，這是關於「權衡切身的關連」面向的第三種反應。相對的，法國教科書對於二戰期間人民抵抗德國的事蹟便大加宣揚，以「英雄」評價、讚揚同胞的愛國情操。

至於中日戰爭，長久以來海峽兩岸均以「八年抗戰」定論，成為主要的歷史解釋，明顯展露出典型的「貶抑敵人的存在」、「讚揚同胞的奉獻」之處理方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科書中，即以大篇幅的文字、圖像探究南京大屠殺（Nanjing massacre, 1937），成為控訴日軍暴行的重要主題，成為凝聚國家認同的要件之一，並與其他偉大的歷史事蹟共同形塑，賦予中國民族主義一種天命、神聖的「奇里斯瑪」（charisma）特質。

反觀日本，歷史教科書針對個人或國家在發動戰爭上的「責任」，保持靜默；但面對戰敗的事實，則透過廣島原爆等事件呈現「受難」形象，藉以批判美國及蘇聯，同時宣揚勇氣、犧牲、生離死別等意涵，充分反映出文化價值和意識型態的主導力量。而其他諸多的戰爭事件，尤其是可能造成負面評價的史實，全部都消失了。因此，作為與中國教科書對立面的日本教科書，「權衡切身的關連」、「貶抑敵人的存在」、「讚揚同胞的奉獻」的處理方式一樣不缺，可說是旗鼓相當。

美國教科書關於大戰的描述，是以高調的理想、善行、力量、愛國心，以及國家主義為主軸，呈現的其實是一種有限的觀點，但這種「勝

利、成功」的基調，足以使多數公民和學生感到自豪，從而在國家認同之下凝聚不同的族裔與文化，形成一個團結的社會。

在《戰爭、國家、記憶》兩位作者的探究下，各國教科書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的編寫，呈現了多樣的形塑手法，但歸納來看，各國的目的似無二致，不約而同地以選擇性的記憶、失憶，乃至創憶，重新建構了戰爭時期的國家歷史，透過符應政治、社會、文化價值或意識型態的內容，完成凝聚「國家認同」的任務。在這樣的任務下，敵人面貌不是模糊不清，就是僵化、醜陋，而且都是靜默無語，而發言權全落在己方，只有自己人才具備人的形象，但往往以同胞之愛、祖國之愛大肆聲張。

我們如何關照不同國家的歷史經驗、社會文化價值（或意識型態）所帶來的不同歷史解釋？面對差異，該不該予以尊重？透過某些程序，我們可能為「差異或衝突」之處理，尋得或建立一種普世的判準嗎？當我們企圖以「批判」之姿加以區辨、乃至褒貶各自的歷史教科書書寫時，我們的「位置」是否足夠穩當？歷史教科書作為一種特殊的歷史書寫形式，往往帶有許多政治、社會、文化的價值觀或意識型態，我們應該或能夠以相同的學術標準來加以評價嗎？教科書作為一種教育的文本，我們如何評估與反省其諸多爭議為「教育」的價值或意義所造成的挑戰？

以上諸多問題，《戰爭、國家、記憶》兩位作者並沒有進一步探究，本書因而只是一揭露之作，但就此而論，其價值已值得肯定。只是，接下來我們該怎麼辦？針對「國家」的論述，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探討，比較直接的轉變有二，一是走向「世界史」，一是返回「個人史」或「庶民大眾史」。

前者目前可見的努力是合寫教科書，德國已分別與法國、波蘭一起共編歷史教科書，中國、日本與韓國的學者與教師也針對近現代史課題，初步合作完成教科書的編寫。當然，合編教科書能否促成更加設身處地面對彼此糾葛的歷史，逐漸消弭抱怨、否認、悲情，尚待觀察，考



驗其實不小。此外，世界史的書寫形式或許也才能促成以更寬廣的格局來思考人類的命運，不再只是冷眼旁觀、甚至漠視別人的痛苦，這應該可以為人類整體共同價值的凝聚尋求一種新可能。

至於後者，相關學術研究（或小說）早已開始，但許多課題尚待探究，例如我們可以想像 1945 年之後多數德國婦女面臨喪夫喪子的悲痛與社會經濟的殘破，其心境的轉折與對戰爭評價的轉變；皇民化運動下的太平洋戰爭時期，臺灣青年在家國間或不同的民族認同折衝之個人經歷等。其實，各國許多參戰老兵在多年之後，選擇以不同的書寫或口述形式呈現（或再現）對於戰爭的細緻描述與個人見解，多少都能夠在國家史的書寫之外提供新視野。「個人史」或「庶民大眾史」的「發聲」，或許更有機會將戰爭議題拉回到人性、人權的探究；在這個層面上，1929 年問世的《西線無戰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深刻呈現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 1898-1970）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親身經歷、感受與評價，至今仍可視為關於戰爭的「個人史」或「庶民大眾史」書寫典範。

在本質上，歷史即是「選擇性的過去」，甚至被認為是「通往未來的過去」，小自個人、家庭，大至社會、國家，「透過對於歷史的重建，進而重建當前的自我」的過程，一直是持續進行的事實，你、我都難以否認，重建是一個十分複雜的過程，歷史學研究的重要性一部分之意義就在此。關於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課題的各國歷史教科書文本研究，其所帶來的挑戰既具體又深刻，《戰爭、國家、記憶》提醒我們不僅對於「歷史」，還必須對於「教育」的意義做出更為嚴肅的思考。